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史

1949——1966

赵德馨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11
D03
533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史

1949——1966

赵德馨 主编

P 802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辛发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966)

赵德馨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26印张，60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精)1770册

ISBN7-215-00542-9/F·134

定价： $\frac{(\text{精})9.60\text{元}}{(\text{平})8.00\text{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导 言

赵德馨

一、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意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已经历了38个年头。38年，对具有6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只是一瞬间；对人类历史长河来说，不过是一朵浪花。然而，对从苦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并有幸参与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中国人民来说，这38年是何等辉煌的历程！甘苦自知，每一步都值得回首品味。对世界人民来说，这38年间，亲眼看到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范例，也会佩服惊异，欲穷其究竟。

在38年中，我们创造性地开辟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消灭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38年来，我们努力与贫穷和不发达作斗争，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面貌。每人占有的粮食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10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的繁荣昌盛。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安居乐业。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生机勃勃。在中国悠久的

历史中，没有哪一个阶段的38年，可以和这个38年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它彪炳人寰，无比壮丽。

38年来，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济变化空前剧烈。这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我们在探索中前进。在探索过程中，出现踉跄、踟蹰、迂回，步伐或快或慢，但是总的趋势是前进了。我们为成功、胜利高兴过，也为挫折、失败痛苦过，这38年，是探索的年代，变革的年代，胜利的年代。这探索，这变革，这胜利，交织成一幅伟大时代的画面。它是一部新旧经济形态交替史，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建立和巩固史，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业史。在中国经济史上，这是最新的篇章，也是最辉煌的篇章。为了有利于当前和今后的现代化进程，这篇章——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应该及时谱写出来。这篇章是我们用行动谱写出来的，理应由我们用文字表述出来。创业的时代需要信史。当时的当事人，我们，有责任写出信史。

建国以后的这3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从历史即过去的事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从其所属的时代为当代的事这个意义上，又可称之为“当代中国经济”。研究这个阶段的经济史，除了有研究经济史的一般功效外，还有其特殊的意义。

（一）有助于推进当前的经济建设与改革。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迎接经济建设的伟大任务，这次会议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历史的回顾，指出基本经验教训的要点，为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为了搞好经济建设，必

须深入地研究建国后经济发展过程，并为此作出了一系列的安排。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为此，必须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改革是多方面的，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心环节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其所以需要较长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在实践中，正在创造中，至今还没有一种完善的、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诫我们，即使在别的国家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完善的模式，我们也不能照搬。经济体制本来就应因不同国度的情况而异，因不同时期的情况而异。不可能有一种适用于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固定模式。为了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使改革顺利进行，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其中首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理论的准备。中共中央在提出改革任务的同时，就提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有关理论问题的任务。1979年4月上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强调：为了做好当前的和今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改革工作，要立即组织各有关方面的力量，总结国内的经验，汲取国外的好经验，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改革这件事如果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缺乏对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办不好的。中共中央希望做理论工作的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能在这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的这个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正是响应这个号召而自愿组织起来的。

需要这样做的道理是不难明白的。因为，为了使改革进展顺利，必须弄清楚几个问题：为什么要改革？现存经济体制中，哪

些仍需坚持，哪些定要改革？怎样改革？今后应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得到启示，但根本的途径却是从本国人民实践的历史中寻求答案。事实正如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的：“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①本国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符合国情，干部和群众有切身体验。问题在于对自己的经验要作深入的、具体的、系统的、正确的总结，并用各种办法使干部群众了解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有过几次大的曲折，除了其他因素外，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正确地认识国情，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使之系统化，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正确地总结经验有了可能。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随后的多次党的重要会议的决议，为正确认识建国以来的主要经验提供了依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深入地、具体地、系统地、正确地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进行综合研究。分析何时做了何事，成败得失如何，有何经验，有何教训。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揭示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来，为当前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

（二）从动态中正确地认识国情。要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取得胜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正确地认识国情。怎样才能正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71页。

确地认识国情？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解剖横断面的方法，或静态分析法。如调查有多少土地、耕地、人口、资源、企业等等。这种方法是研究国情必不可少的。另一种是解剖纵的发展过程的方法，或动态分析方法，从运动过程中认识各种因素（如人口、耕地、政策……）本身是怎样变化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采用后一种方法研究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诸因素及其整体状况的变化，才能使我们认识中国经济运动的轨迹和规律——国情中最根本的部分。从中国当前对国情研究的情况来看，大多使用前一种方法，这是多年来研究国情问题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要缺陷。

认识过去和现在，是科学地预测未来的基本方法与基本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去发现。建国以来，我们的经济工作是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前进的。可以说，过去的38年，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佳道路的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长期反复的实践过程中，一般地说，成功了，表明做法是符合国情的；失败了，表明措施可能与国情不相符。因此，只能经过一段时间（有时是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实践以后，回过头来研究一番，才能摸清、摸准中国的国情，也才能看清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这种从动态中认识国情的方法，包括再认识，理清思路。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再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结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中国人民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是从动态中认识国情的基本途径，对今天和今后的探索会有直接的帮助。

（三）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以往的一切经济不同，不是自发地产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是

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自觉地建设起来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①只有首先研究具体国家的生产和交换的每一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才能建立科学的、适用于该国的政治经济学。否则，只能照搬外国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这样做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吃够了苦头。我们再也走这条路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怎样才能建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占人类1/4的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它提供了条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从实践中能抽象出正确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曾经有过多种理论主张，有的理论曾付诸实践，接受了实践的检验，可以在总结经济实践过程——经济史——中，逐一地检验哪些理论已被实践所否定，哪些理论已被实践所证实，哪些理论已被实践证明一部分是正确的，另一部分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得到修正与补充。只有这样地去做，才有可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才能用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新的理论从何而来？只能从研究人们的实践经验中抽象出来。邓小平说得好：“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出科学”。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基础。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②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55页。

础学科。离开了经济史，即离开了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不能抽象出正确表述经济规律的理论的。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是以英国为典型的。他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①。马克思如果不作这番研究，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如果不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就不可能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不可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去3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又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认识提高和深化的过程。认识与历史一同前进，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逻辑也应该从该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将有助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丰富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除了政治经济学这门探索经济本质的经济科学外，探索经济运行的经济决策科学和探索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科学，同样也都要建立在研究经济史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在建设适合国情，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在这起步的时候，应充分重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使经济理论的建设少走弯路，健康地发展。

（四）进行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要使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顺利进行，关键的一条是全党全国人民认识一致，步伐一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干部认识的一致。全国人民对经济建设与改革有思想准备，加上一批对此有清醒认识、行动一致的干部，是建设与改革取得成功的条件。人民的思想准备和干部的成熟，靠参与

①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也靠思想教育。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有助于人们认识国情，懂得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性；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要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认识到加速经济建设与改革是顺乎民心与历史要求，有益于增强信心，振奋精神。这样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部好教材，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将起很好的作用。

在一部分青年学生、干部、群众中，存在一些认识问题。究其实质，大都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以及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来回答。从经济史这门学科来说，中国近代经济史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旧中国留下的遗产是贫穷与落后。新中国经济史则证明，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国家强盛，人民共同富裕之路。常常遇到一些青年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不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学习新中国经济史，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起点和过程，他们就会懂得：简单的对比是不科学的，必须将工作上的失误、经济体制上的弊病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区别开来。每一个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人，都会从确凿的事实和正确的对比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至停滞倒退”。^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问题在于经济体制要改革。我们能够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我们有跻身于先进民族之林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5页。

的能力。必须加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艰苦奋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

(五) 推动对外交流。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许多国家、政党、团体、公司、企业和个人与中国发生经济交往。他们都想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现在，以预测发展趋势。相当数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有与中国相似的苦难经历，又面临着我们在过去30多年中曾经面临的问题。他们希望了解和研究中国的经验教训。当前，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互相了解情况，彼此借鉴。我们有责任编写新中国经济史，为他们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与经验提供方便。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谁优谁劣的思想理论斗争将继续进行。在国际上，有一些人故意诋毁中国30多年来建设的成就，也有一些人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时，由于没有能掌握系统的符合真情的材料，加之观点、方法的偏颇，结论往往不符合实际，歪曲了我们走过的道路。编写出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可以为希望了解中国的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同时也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击那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诋毁。

去旧创新、开辟历史新纪元的经济变化需要记录。几亿人民的创业活动要求有信史。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事业需要有历史经验作借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向前发展。世界人民需要了解新中国。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是时代的需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属于经济史学科中的国民经济史。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与统一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

国民经济史的特点是研究一个国家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它包括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经济形式，各个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所谓整体，当然不是它们简单相加的总和，而是有机结合的统一物。

关于国民经济史的一般特征，它与其他各类经济史的区别，属于经济史学概论学科的任务。这里，仅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具体情况，说明它的时间界限，空间界限与学科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要从动态中阐明国情，要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探讨规律，就必须根据历史事实作纵向的研究。这不能不首先确定研究的上限与下限，即时间界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上限。这样确定上限，是与本门学科的名称一致的。有一种意见将这门学科称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这个名称的好处是能与“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史”等并列，突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特定的性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经济发展史，就名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照此办理，研究1949年10月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史，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似乎无可非议。其实不然。“社会

主义经济”这个概念，可以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可以指“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同时出现。因此，把十月革命后的经济史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史”，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含义，无论是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都是可以的，都符合历史实际。中国则不然。中国革命的特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二者直接衔接，但完成的任务是不同的。民主革命的胜利，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长期武装斗争时期。在民主革命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地区里，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和新民主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包括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紧接着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在中国，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这个名称，其内涵若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史”，则这部历史应从1927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革命根据地出现时为上限；其内涵若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史，则应从1956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建立时为上限。因此，这个名称在时间界标上不够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则明确地表示研究对象的时间界标，其上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1949年10月1日。

有一种意见将本门学科定名为“中国现代经济史”。这样命名的好处在于与“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相对应。

“中国现代”是指什么年代，在学术界仍有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统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涵，在地理界限上包括台湾、

港澳等地经济发展状况在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地理界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实现管辖的地区，即除台湾、港澳等地区以外的中国领土。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地区经济形态发展的过程。它的上限是1949年10月1日，它的下限将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断延伸。它所研究的正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部。我们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以当前正在进行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开始之年，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结束之年，即1984年为下限。

(二) 指导思想。科学研究中的任何一种系统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一种研究方法。

我们这个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成立之初，在讨论研究方法时，一致同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方法、观点分析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不需多加说明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他们在这个时期用求实的态度研究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有重要关系。没有后面这种研究，不可能知道经济形态是变化的，不断交替的；不可能知道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正确地位；不可能把社会关系归之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之于生产力，即归之于物；不可能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即客观的发展规律。一句话，没有这种研究，便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它运用于研究经济学、历史学、经济史学、法学等社会学科时，便使这些社会学科发生了一场革命：

从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变成了科学。在此以后，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一部分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部分人则不是。百余年来，这两部分人都取得了成果。至于成果的性质和大小，则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这样的，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是这样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1980年访问我国时说：新剑桥学派和近来的学院派都遵循着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体系大体相似的境地。两派都认为资本主义蕴含着它自身崩溃的种子。她还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长远看问题的，这是同长期动态的分析有关，而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另一位英国学者，已故的著名经济史学家特·阿胥敦在一篇题为《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处理》的文章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中叶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之一。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自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而不是搬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成结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在地平线上出现时，马克思、恩格斯早已作古，他们未曾见到这种经济，未曾对它作过分析或发表过意见。因此，不可能搬用他们的现成结论——根本不存在这种结论——作我们的结论。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情况也是相同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改造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同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

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迅速发展。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现在回过头去研究建国以来的经济历程，也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评价其得失，为今后的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并抽象出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起指导作用的经济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基于上述情况，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更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占着多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方面作出的贡献最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这是明显的事实。不应忽视的是，一些并非共产党员的经济学家，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亦即人们的实践，检验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主张、意见，而不以人的政治面貌、政治地位定是非。

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倡导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全会精神指导下，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在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